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 唐宋散文

葛晓音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 唐宋散文

葛晓音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这套丛书是向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知识，内容包括文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流派，以及文学体裁方面的基本知识。丛书的编写力求观点正确，内容充实，叙述简明扼要，文字通俗易懂。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唐 宋 散 文

葛 晓 音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兵革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83,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325-0692-4

I.426 定价：1.70 元

# 目 次

|                         |     |
|-------------------------|-----|
| 一、初盛唐散文的发展 .....        | 1   |
| 二、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 .....       | 15  |
| (一) 韩愈 .....            | 18  |
| (二) 柳宗元 .....           | 39  |
| 三、中晚唐散文的趋向 .....        | 55  |
| (一) 中唐其他散文 .....        | 55  |
| (二) 晚唐散文的衰落 .....       | 59  |
| (三) 唐末小品文的光彩 .....      | 66  |
| 四、宋前期散文的复兴 .....        | 79  |
| (一) 柳开和王禹偁对五代体的变革 ..... | 79  |
| (二) 从西昆体到太学体 .....      | 85  |
| (三) 尹洙、范仲淹和苏舜钦 .....    | 90  |
| 五、北宋六大家的散文成就 .....      | 100 |
| (一) 欧阳修 .....           | 100 |
| (二) 曾巩和王安石 .....        | 111 |
| (三) 苏轼 .....            | 124 |
| (四) 苏洵和苏辙 .....         | 138 |
| 六、宋代其他散文 .....          | 151 |
| (一) 北宋中后期散文述略 .....     | 151 |
| (二) 南宋散文述略 .....        | 156 |
| 七、结束语 .....             | 163 |

## 一、初盛唐散文的发展

中国古代散文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尚书》。《尚书》是五经之一，又称书经，共分虞、夏、商、周四部分。目前一致认为《商书》中的《盘庚》是可靠的殷商文献。此外，《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散文，其中也有一些可信的篇章，属于誓、命、训、诰一类记言之文，文字古奥难懂，从中可以窥见上古散文的最初面貌。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兼并战争极其激烈，学术思想空前活跃。散文逐渐成熟，进入了全面兴盛的时代。《春秋左氏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叙述错综复杂的史事，情节布置紧张曲折，人物刻划生动逼真；《老子》、《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散文从语录体、对话论辩体进而发展到长篇专论，百家争鸣，风格各异。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言简意赅，说理透辟，气势充沛，善用比喻和寓言来表达严密的逻辑，并以平易流畅的语言，突破了周诰殷盘古奥僵化的形式，形成了既适宜于实用，又富

有文学价值的新文体。

两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综合先秦史学的成就，创造出规模宏伟、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标志着记叙散文的高度发展。西汉政论文偏重于陈述政见，本经立义。贾谊、晁错、桓宽等论政筹策都能直陈利害、切中时弊，风格浑厚朴茂。东汉班固的《汉书》继《史记》之后创立了记述精详的断代史。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王充的《论衡》等，已是内容广博、由几十篇论文组成的专著。东汉散文出现了铺陈排偶的倾向，但还不失汉文气格朴厚的本色，所以唐宋文章家提倡古文，都以三代两汉之文作为典范。

魏晋时期，散文变得通脱清峻、自由活泼。同时出现了句式整齐、专讲对偶的骈（piān）文。到南北朝时期，崇尚文采藻饰的风气愈益盛行，除了部分历史地理类的学术著作外，散文已为骈文所取代。骈体的形式更加精巧，不但对偶有许多类型，句式也渐渐趋向骈四俪六，并讲究平仄配合、用典、比喻、夸饰等艺术技巧。先秦两汉时期，因文学和史学、哲学、经学尚未分家，纯文学的散文还没有出现。南朝齐梁文人提出区分文学作品和应用文章的“文笔之辨”，实际上主要是根据诗赋和其他文体的区别，来划定文学和非文学之间的界线。由于强调文学作品要“吟咏情性”、“感



荡心灵”，讲究辞藻之美，无韵的散文便被排挤到议、记、经史等少数应用文章中去，归入了“笔”的范畴。而骈文既可代替散文用于奏、表、疏、记、书、论，又可用于抒情写志、描绘景物，所以兼有“文”与“笔”的所有功能。

南北朝文章的骈俪化，以及文学从学术中分离出来的趋势，遭到一些持有儒家正统文艺观的文人的反对。西魏宇文泰为革除绮靡文风，提倡复古，把苏绰模仿《尚书》所作的《大诰》定为各体文章的“准式”。隋文帝也下诏命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并将一个用华艳词句写文表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治罪。随后治书御史李滂上表请求禁止“缘情”的词赋，以儒家经典作为文章的“轨模”。他们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最终目的，是将文学纳入儒学的框架，取消诗赋骈文等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形式，甚至用《尚书》式的典诰体代替一切文章，退回到文学附属于学术的上古时代去，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文风问题。骈文非但没有衰落，反而在初盛唐进入了全盛时期，从而引起了以复兴三代两汉散文为号召的古文运动。唐宋散文正是在与骈文的反复斗争和古文自身革新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从唐初到唐中叶韩柳发起古文运动之前，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到唐高宗时期。大唐帝国建立以后，唐太宗和贞观重臣魏征等在总结南朝几代小朝廷灭亡的教训时，认识到绮靡文风对政治的危害，要求淘汰南朝文学中淫艳放诞的内容，使文章为歌颂太平、规讽时政服务。但还没有提出变革骈文的问题。因为骈体赋颂最适宜于歌功颂德，所以凡以文才著称的大臣无不擅长这种文体。除了极少数关于修改历法、议论祭礼的奏疏以外，皇帝的诏诰、臣子的章奏、书信，绝大部分是骈文。这时魏征(580—643)首先在政论文中开始了由骈转散的变革。他的《论政事疏》、《十渐疏》、《论治道疏》、《十渐不克终疏》等奏议，学习先秦古文多用排比的结构，大量使用隔句相对的排比句式。文中或者穿插单行散句，或者打破四六对仗而改用多种句法对偶，虽然仍有不少偶句，但辞意恳切，气势雄骏，从而创造出一种半骈半散的章表体，成为唐代奏疏和政论中最常用的一种形式。除魏征以外，隋唐之际还有一位隐士王绩(585—644)，写了不少言志述怀的散文。如《答冯子华处士书》、《答程道士书》、《自撰墓志铭》等，自述平生散淡的襟怀，以及隐居生活无拘无束的乐趣。只是他的散文模拟前人的痕迹过于明显，象《醉乡记》、《无心子传》，显然是模仿《庄子》；《五斗先生传》和《仲长先生传》则是模



仿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尽管如此，王绩用散文亲切自由地描写日常起居的琐事，暗中抒发不为时用的牢骚，却显示了散文用于抒写情志的趋向。

贞观（627—649）末年到唐高宗龙朔年间（661—663），文坛上又出现了以上官仪（？—664）为代表的“绮错婉媚”的上官体。这时“初唐四杰”（指初唐王勃、卢照邻、骆宾王、杨炯四位作家）用儒家经籍和孔子思想作为理论武器，自觉地担负起廓清这种文风的使命，但他们的文章绝大部分也是骈文。王勃（649—676）还有意用他所写的那些气势“宏伟绝人”的大赋大颂来摒斥雕刻纤微、绮靡琐碎的上官体。所以这次文风革新是骈文自身由“绮碎”变为“宏博”的一场革命，不但对散文的复兴没有促进作用，反而为讴歌圣明气象提供了一种堆满“乾坤日月”、“山河鬼神”等宏丽词藻的大型骈体赋颂，导致初盛唐骈文向着虚夸、冗长的方向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武则天至唐中宗时期。由于武后爱好文章词采，不少官员因文才藻丽而得以飞黄腾达，朝廷上下竞相追求华丽文风。讲究对偶工整、雕琢词藻的骈文几乎占领了散文的全部领域，甚至连分析案例的书判和对策，都变成了词章漂亮的骈文。另一方面，一些较有政治远见的政

治家如郭元振、姚崇、宋璟、陈子昂等，又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和批判。他们所上的奏疏大多是散文，只就国事陈述具体意见，朴实无华，务求实用。陈子昂(661—702)主要致力于诗歌革新，但提倡朴素、反对雕饰的主张对他的散文创作也有明显的影响。他的文章大半是采用典故文的四言句式，文字典雅古奥，又吸取了骈文的语法和用典，这说明他也是把《尚书》中的誓命训诰看作复古的最高标准的，这种僵化的文体并没有发展前途。不过陈子昂还有一些揭露时弊，指陈朝廷得失的政论散文，写得朴实平易。例如《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中有一段描写边民饥饿疲惫的悲惨情状：“磧路既长，又无好水草。羊马因此重以死尽，莫不掘野鼠、食草根，或自相食，以活喉命。”通俗明白，接近口语，在当时半骈半散的政论文中极少见。此外如《堂弟孜墓志铭》赞美他堂弟英伟耿介的气质，笔意雄俊倜傥，很有气概。这类文章确实可称韩愈的先导。

第三个阶段是盛唐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到唐德宗贞元年(785—804)前。唐玄宗早期励精图治，把返朴归淳当作治理国家的根本。他曾大力倡导复古，革除浮华文风；而复古的目的是为了“移风俗、美教化”，所以他又需要那种专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大赋大颂。于是盛唐的文坛上就出现

了这样的变化：一方面，骈文更加兴盛，群臣为了迎合皇帝的心理，进献了大量叙述符瑞、形容盛德的纪颂。另一方面，散文开始增多。诏诰、疏议、墓志、碑文渐由骈文转为散体。骈文散文的分工也因而趋向明朗：凡是需要歌咏赞颂的应酬文字，多用骈文；凡是务实致用的文章，多用散文。只不过这时的散文还夹杂着大量骈句，可以看作是一种过渡文体。盛唐两位著名宰相张说、张九龄虽然进献赋颂最多，但在文体由骈转散的变化中，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张说(667—730)除一部分表奏采用骈散夹杂的形式以外，有一篇用散文写的《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是初盛唐时期塑造人物最完整、最传神的一篇传记。它突破了隋唐以来碑传和行状空泛称颂功德的俗套，通过典型事例的选择和生活细节的描写，记述郭元振年青时仗义疏财、劫富济贫的侠义行为，以及显贵后仍无住宅、寄居友人之家的清贫生活。同时又穿插描写他平靖边塞的功业和受朝内小人忌害的遭遇，鲜明地再现了郭公意气纵横、磊落奇伟的个性。文中还引述郭元振上武后的《古剑歌》，以古剑冲腾的光焰烘托郭公不凡的气宇，并详细描绘了郭元振平定河西后，旌节刚到玉门关，凉州城中的男女便拥上大路、歌舞远迎的场面，以突出他在边地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一个“威容端毅、

风鬣如神”的传奇式人物因此跃然纸上。张九龄(673—740)所上的书表也大多用比较朴实明白的散文写成。有些代皇帝写的敕书亲切平易，几乎和白话差不多，如“绝域行人，不容易也”，“秋后渐冷，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等等。朝廷文风的转变，对一般士人也有明显的影响。如下层文人请求王公贵人推荐的干谒书启，原先都用便于炫耀文采的骈文，而李白的《与韩荆州书》、王昌龄的《上李侍郎书》等就改用散文，直接披露胸襟，洗刷了骈文华而不实的虚浮和夸饰。又如王维(701—761)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以散文诗般的文笔，抒写夜登华子冈，独对山中月色、林外远火和夜舂钟声的感受，又以想象中的春日辋川的景色招引友人裴迪和他一起隐居，实景和虚景随思绪的变化巧妙自然地构成富于诗情画意的境界。他的《招素上人弹琴简》也是一篇隽永的散文。这些作品的出现，打破了齐梁以来书简被骈文垄断的局面。

天宝中，李华、萧颖士、贾至等文人为了称颂统治者扭转文风、复兴风雅的功绩，提出效法三代古文，使儒术和古文的复兴与大唐继承唐尧虞舜之治的盛明气象相称。安史之乱后，大唐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剧烈变化，促使文人们开始认真地思考起拯救国家命运的办法来。从肃宗到德宗贞元

年间，复古思潮十分盛行。元结、独孤及、崔元翰、权德舆等人大力主张用散文“尊经”、“载道”。他们和李华、萧颖士、贾至等人一样，认为时世的治乱取决于礼乐的兴衰，文章和音乐一样，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关系到国家的兴亡。讴歌王道的颂声可证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穷愁怨刺的哀音则预示世道丧乱，国运衰微。从战国到六朝，政治之所以混乱，篡夺之所以频繁，主要因为文风绮丽，怨靡之声太多。安史之乱就是因为臣子不讲忠信廉耻，所以应当以儒家的礼义道德作为统治思想的根本。而从魏晋以来儒学愈益衰微，又是由于人们普遍好尚浮靡文风的缘故。为此他们主张用“典谟誓命训诰之书”来取代那些讲究四声八病<sup>①</sup>的“俚偶章句”，从改革科举入手，反对进士科根据“俚偶章句”取士，批评明经科死背经书，要求通晓儒家经典的义理。梁肃、柳冕又把他们的意见加以综合，提出了“文本于道”的主张。不过，古文运动先驱所反对的“俚偶章句”，主要是指那些“词绮靡于景物”的诗赋和骈文，再加上他们认为雅颂之音才是国家兴盛的象征，所以，冗长夸饰的骈体赋颂不但可能遭到排斥，反而要大力提倡。同时，

---

<sup>①</sup> 南齐永明年间，沈约把汉字的平、上、去、入四声运用到诗歌的音律中去，提出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声病应当避免。这也适用于骈文的声律。

他们所推崇的古文的最高标准，还是典谟、训诰一类上古之书，没有意识到要发展古文，还要对古文自身进行革新，尤其要解决在文学领域内如何与骈文争夺优势的问题。由于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古文运动先驱的散文成就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局限。

随着复古思潮的盛行，散文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古文运动的先驱们利用书、论和文集序等体裁，写下了大量议论散文，阐发他们复兴古道、改革文风的主张。萧颖士主要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他的干谒书启大多用散文，但过于冗长铺陈。李华作过几篇评论交友之道、文质关系及当代人物的散文，也都比较枯燥。较有特色的是他为中央的中书、御史到地方的刺史县令等各级官吏所撰写的《厅壁记》，这些文章列举历朝曾任此职的名臣，提醒现任此职的官员以他们为楷模，牢记自己的职责，尽瘁王室，勤政恤民。其实这是用“记”这种形式写的训诰式议论文。他的名作《吊古战场文》想象秦汉以来边塞多事、战场上三军覆没的景象，写得愁惨悲凄。文中运用大量辞赋句和四言古文句穿插交错，在当时骈散相间的流行文体中可称得上是别具一格的。独孤及除了用散文写作表、议和序文以外，还有几篇山水亭阁记。这些作品一般是记述一亭一泉的掌故和地势，最后引申

议论；也有一些写景的段落，如《卢郎中浔阳竹亭记》：“亭前有香草怪石，杉松罗生，密篠翠竿，腊月碧鲜。风动雨下，声比箫籁”，较有幽趣。但他的文章艺术上可取之处不多。梁肃、柳冕等都只用散文撰论，只有元结在古文创作中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元结(719—772)，字次山，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人。天宝进士、曾任水部员外郎、道州刺史、容管经略使等职。他的政论和文论朴质有余，文采不足，但格调高古，完全改变了当时散文大量夹杂骈句的结构，也没有典谟训诰体的气味。这些议论文有的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角度，探讨国家兴亡的道理，如《时化》、《世化》、《七不如七篇》等；有的深入分析唐王朝在收复两京后迟迟不能恢复安定局面的原因，如上肃宗的《时议》三篇；有的对天宝以来朝政一直被妒贤忌才的权贵所把持的现实痛下针砭，如《与韦尚书书》、《与吕相公书》；有的阐述刺史在治世和乱世中对人民应负的重大责任，如《道州刺史厅壁记》。这些文章不但议论切中时弊，见识高人一着，而且饱含愤世疾俗的激情，以及对民生疾苦的深切体验。

元结的山水亭阁记和讽刺杂文数量较多。前者大多采用即景寓意设譬的构思方式，由日常生活中所见景物引起有关理政、立身的议论。如



《茅阁记》，从平昌孟公镇守湖南时和诸宾客闲游纳凉的茅阁，联想到天下苦热，贤人君子应作苍生麻(xū)荫(保护)的道理。《菊圃记》由舂陵一带不知种菊的风俗，谈到士人立身不可不谨慎选择环境的感想。《石溪记》写道州城西一条无人赏爱的小溪，也未尝没有包含作者自己的身世之感。文中写小溪的景致：“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qí)嵌。盘缺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虽还只是简笔勾勒，但自成涓洁清幽的佳境。其他如《殊亭记》、《广宴亭记》、《九疑山图记》等，也都打破了初盛唐亭阁记主要为佛寺仙坛铭记功德的僵滞状态，具备了山水游记的雏型。

元结的讽刺杂文大多是借一件事或一个字的意思引申开去，巧用比喻发挥成文。如《丐论》假设自己与乞丐交友，在“丐”字的引申义和喻义上大作文章，指出路旁的乞丐不过因贫穷而乞讨衣食，那些奴颜卑膝、乞名求利、甚至亡国败家、苟全性命于奴仆的各种小人，才是实质上的乞丐。《恶圆》从乳母用圆转之器给婴儿取乐的一件小事，引出一番为人处世宁方不圆的大道理。《化虎论》评述友人在地方官任上试图化虎豹为鹿麋、化鸱枭为鸬鹚的荒诞幻想，赞美了通过教化，使天下邪恶变为忠直、竞进变为退让的善良愿望。此外，如

《恶曲》、《癡论》等也都以事为喻，以喻说理。这些文章不以华丽的词藻取胜，而以锋利的见解和深刻的寓意发人深思。文笔虽然还不够生动流利，但为唐代散文开创了两大类最常用的体裁。并为韩愈柳宗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验：凡是成功的文学性散文，往往“多激发”，“多嗟恨”，“多伤闵”（元结《文编序》）。清人刘熙载说元结之文是“狂狷（juān眷）之言”，“虽若愤世太深，而忧世正复甚挚”（《艺概》）。元结散文的艺术感染力正是来自这种真挚深沉的愤世忧世之心。

总的看来，从初唐到中唐前期，散文的发展是曲折而缓慢的。主要原因首先是骈文流行文坛五百年之久，形式愈益精致完备，已经成为一种最适宜于表现辞藻、用典、声律等技巧的文体。历代爱好形式美的帝王显贵将骈文当作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标准，促使人们代相沿习，久而久之，便习惯了这种文体的写作方式。所以虽然经过几代文人的批判，骈文的影响依然很深，许多散文在语言结构、文章布局、构思方式等方面，仍不能从骈文的写作习惯中完全解脱出来。其次，初盛唐统治者需要歌颂盛明的文章来为他们粉饰太平，于是一般文人都把纪功德、颂王政看作是彰明古道的头等大事。所以初盛唐文人虽然对那些吟咏风花雪月、风格绮错婉媚的骈文进行了革新，代之而起的